



孟加拉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与特点

李福泉 王雪羽

DOI:10.16293/j.cnki.cn11-1345/b.2021.06.016

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2021年，孟加拉国人口约1.6亿，其中约88%为穆斯林^①，这使其成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第四大国家。与南亚次大陆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孟加拉国穆斯林绝大部分属于逊尼派。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以来，虽然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呈现出鲜明的世俗特征，这与孟加拉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息息相关。伊斯兰教自公元8世纪进入孟加拉地区后，与印度教、佛教等宗教交往互动，并受殖民主义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本土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孟加拉国伊斯兰文化。孟加拉国穆斯林虽然规模庞大，但至今很少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初步探讨孟加拉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与特点，以推进国内孟加拉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增进对世界伊斯兰教多样性的认识。

一、发展阶段：公元8世纪到16世纪

伊斯兰教进入孟加拉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8世纪，阿拉伯商人通过贸易往来将伊斯兰教传入了孟加拉东南部沿海城市。考古发现显示，孟加拉东部帕哈普尔和迈纳马蒂的历史遗址中存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隆·拉希德(Haroon al-Rashid, 786—809年在位)统治时期所发行

的金币。^②9世纪，已经有阿拉伯人在吉大港区域定居。公元11世纪，苏菲派修士和学者开始进入孟加拉东部宣传伊斯兰教。1053年，著名苏菲派修士沙阿·苏勒坦·鲁米(Shah Sultan Rumi)及其门生抵达孟加拉北部进行宣教活动。^③

由上述可知，在穆斯林于13世纪初征服孟加拉地区之前，伊斯兰教已经在当地传播了数个世纪，商人和苏菲修士是宣传伊斯兰教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后者凭借对当地文化非凡的包容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孟加拉地区先后被尊崇佛教的波罗王朝(Pala Dynasty, 750—1174年)和信奉印度教的犀那王朝(Sena Dynasty, 1070—1230年)所统治，前者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绝大多数臣民为佛教徒，伊斯兰教只局限在小范围内传播；后者则大力推行印度教，严厉镇压异教徒，确立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此情况下，受到宗教和世俗双重压力的孟加拉地区底层民众开始被苏菲派修士所宣扬的平等和包容的教义和生活方式所吸引，加入了穆斯林的队伍。“苏菲派圣地对所有人开放，而低种姓和贱民不能进入印度教寺庙和接近婆罗门祭司。苏菲派圣地是沉思和冥想的中心，是培训入门者、解决情感困扰和寻求灵魂慰藉的场所，在孟加拉低种姓农村群众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④因此，苏菲派成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地区早期传播的主要形式和本土化的主要载体。

1203年，来自阿富汗的突厥将领巴赫蒂亚尔·卡勒吉(Bakhtiyar Khalji)对北孟加拉邦的征服加速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此后，孟加拉被纳入了德里苏丹王国的统治范围，伊斯兰教也伴随着突厥人的统治大规模进入孟加拉地区。在穆斯林上层统治者和苏菲派修士的双重作用下，孟加拉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苏菲派道堂，大批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土著居民改信伊斯兰教。

1352年，沙姆苏丁·伊利亚斯·沙阿(Shamsuddin Ilyas Shah)统一了恒河三角洲、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地区，脱离德里苏丹王国，建立孟加拉苏丹国(Bengal Sultanate)。作为孟加拉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穆斯林王国，它加速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尽管孟加拉苏丹国在意识形态上与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的西亚保持了一致，但孟加拉非穆斯林土著对国家管理事务的参与以及他们与穆斯林的交往，使孟加拉伊斯兰教的发展呈现本土化特点，孟加拉语的变化和广泛使用是其重要体现。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是孟加拉穆斯林统治者的语言，孟加拉语从中借用了大量词汇，逐渐成为孟加拉穆斯林宗教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此同时，孟加拉诗人和作家也在官方支持下从波斯、阿拉伯和本土文化中取材，开始用孟加拉语书写文学作品。其中的代表有沙阿·穆罕默德·萨吉尔(Shah Muhammad Saghir)和赛义德·苏尔坦(Syed Sultan)。^⑤为了让孟加拉人以更加容易和熟悉的方式理解伊斯兰知识，孟加拉早期穆斯林文学作品中渗透进了大量本土元素，这在有关伊斯兰教历史和传奇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⑥这充分说明，这些诗人和作家具有明显的本土化意识。他们的创作为本土化伊斯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大环境的限制下，早期孟加拉伊斯兰文学的影响还比较有限。

在这一时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兴起阻碍了伊斯兰教在孟加拉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这主要是由于穆斯林统治者脱离德里苏丹王国的统治，不得不寻求印度教精英的支持。^⑦同时，孟加拉苏丹国的独立切断了孟加拉穆斯林与南亚次大陆其他地区 and 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统治者难以从这些地区招募行政和军事人员，使得孟加拉苏丹国的许多土地和行政职位都被本土的印度教精英所把控。因此，孟加拉穆斯林主要从苏菲神秘主义中寻求精神

慰藉，对伊斯兰教知识的了解并不深入，其伊斯兰文化受到苏菲派折衷思想的影响，融合了大量佛教和印度教的宗教规范和符号，许多穆斯林皈依者都保留了本土的习俗和社会行为。

二、深化阶段：莫卧儿帝国时期(1576 - 1756年)

莫卧儿帝国是南亚历史上最强大的穆斯林帝国，在其统治下，伊斯兰本土化深度发展，伊斯兰文化不可逆转地成为孟加拉文化的主要内容。

经济领域的变动成为伊斯兰教融入孟加拉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契机。莫卧儿帝国为加速对恒河三角洲地区的开发，将大量土地授予无地农民，促进了该地区的人口聚集，三角洲地带的人口中心逐步从西部迁移到了东部。^⑧苏菲派修士在三角洲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助当地居民清理森林、传授水稻种植技术和伊斯兰教知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苏菲派修士所表现出的非凡才能和坚韧品格使他们在孟加拉人心中拥有了很高的地位，他们被尊称为“皮尔”。^⑨在苏菲派修士的影响下，伊斯兰教的信仰观被吸收融入当地的信仰世界，大批土著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从而在孟加拉地区创造了一个以苏菲派为中心的农业村庄体系，极大地加速了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至16世纪晚期，孟加拉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村落，苏菲派圣人及其后代则发展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宗教乡绅”^⑩，他们接受帝国的土地赠予和赞助，在聚居地修建清真寺和圣墓，它们反过来成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东孟加拉的宗教传统和礼仪与新村庄里的清真寺、圣所开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孟加拉和伊斯兰世界观的混合物。”^⑪随着伊斯兰教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适应孟加拉社会文化环境，伊斯兰权威最终成功在农村地区建立，各类伊斯兰机构逐渐取代了本土机构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逐渐与孟加拉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时期，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但上层穆斯林与本土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使得孟加拉穆斯林社会处于二元分离的状态。在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影响下，孟加拉穆斯林也依据血统和种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模式，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种是“阿什拉夫”

(Ashraf)，指来自伊斯兰世界中心地区的穆斯林定居者，另一种则是“阿吉拉夫”(Ajlaf)，指孟加拉本地的伊斯兰教皈依者。^⑫其中“阿什拉夫”，意为“出身高贵”的穆斯林，主要是来自西亚的移民，这些人因贸易、军事征服、管理以及宣教活动定居孟加拉。“阿什拉夫”又按照血统和地理来源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阶层：地位最高的为赛义德(Sayyid)，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的嫡系后裔；其次是谢赫(Shaikh)，意为“酋长”或“首领”，主要是迁入孟加拉的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代；莫卧儿(Mughal)和帕坦(Pathan)则分别是征服孟加拉的蒙古人和阿富汗人的后裔。^⑬“阿吉拉夫”，即“出身低微”的穆斯林，主要指孟加拉本土来自印度教的皈依者，他们深受印度教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影响。“阿什拉夫”和“阿吉拉夫”在孟加拉形成了几乎独立的两个社会。

在孟加拉穆斯林内部划分为两大群体的情况下，他们在语言文化上与印度教徒进一步融合，两者宗教身份的界限并不明显，名字称谓、衣着穿戴、生活习俗接近，两者之间的跨族婚姻也十分普遍。“总体上，孟加拉穆斯林遵循伊斯兰教的禁令，但某些创新和非伊斯兰的做法在他们中间盛行。”^⑭同时，“皮尔崇拜”成为孟加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信仰的一种形式，各地都出现了围绕圣人和神话英雄人物所建立的陵墓或坟墓，圣人不分宗教受到孟加拉人的敬拜。^⑮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共享文化传统是孟加拉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必然结果。

以孟加拉语为基础的伊斯兰文学进一步发展，是伊斯兰教本土化深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孟加拉穆斯林对伊斯兰传统知识需求量的上涨，涌现出一批穆斯林学者，他们以孟加拉语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进行创作，使得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神秘主义、挽歌等多种伊斯兰文学体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三角洲开发阶段，为了在农村地区传播伊斯兰思想，孟加拉穆斯林将伊斯兰教的形象和思想与民间对巫术、鬼怪和野生动物的信仰相联系，导致孟加拉语文学和民间传统中充满了许多与开发森林、扩大耕地和传播伊斯兰教有关的英雄人物。^⑯

三、变革阶段：英国殖民时期(1757—1947年)

1757年，孟加拉地区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在殖

民统治下，孟加拉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恶化了穆斯林的处境，导致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为孟加拉伊斯兰教本土化融入了新的元素。在面对根基深厚的印度教传统的同时，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成为孟加拉伊斯兰教本土化面对的新问题。

在土地、税收、行政制度改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孟加拉原本处于社会上层的穆斯林精英阶层收入大幅下降，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1872年孟加拉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孟加拉总人口的48%为穆斯林，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城市中仅有不到30%的人口为穆斯林，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从属于印度教精英。^⑰随着传统穆斯林机构和精英阶层的衰落，19世纪孟加拉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伊斯兰复兴运动，试图把数个世纪以来累积的非伊斯兰因素从孟加拉伊斯兰教中剥离，具有当时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性特征。孟加拉穆斯林否定本土印度教传统的倾向，既是南亚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矛盾恶化的结果，也与西方入侵下孟加拉穆斯林身份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

孟加拉作为印度次大陆最早被纳入英国殖民统治范围的地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与其他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相比，更深刻地受到了英国的影响，西方法律、政府和教育的引入，使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念遭到严重削弱。1837年殖民政府使用英语替代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在加深西方对孟加拉社会影响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为世俗主义价值观的渗透铺平了道路。随着现代教育在孟加拉地区的发展，孟加拉新一代接受英语教育的孟加拉穆斯林精英普遍受到了西方自由价值和世俗政治的影响。19世纪末，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在孟加拉兴起，其代表纳瓦布·阿卜杜勒·拉提夫(Nawab Abdul Latif)和赛克德·阿米尔·阿里(Syud Ameer Ali)分别于1863年和1878年创立了穆罕默德文学协会(Mohamedan Literary Society)和中央穆罕默德协会(Central Mohamedan Association)，他们呼吁对穆斯林进行西式教育，希望用现代思想和知识激励穆斯林，实现伊斯兰教思想和政治上的复兴。^⑱这意味着西方文化开始深刻影响孟加拉穆斯林，成为当地伊斯兰文化中的新因素。

总体而言，孟加拉伊斯兰复兴运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孟加拉地区伊斯兰文化中信仰、仪式和习俗的净化，但

并未完全消除印度教、佛教的痕迹，绝大多数孟加拉穆斯林仍保留着伊斯兰教与当地信仰和习俗的混合传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第一次将孟加拉穆斯林精英与农村乌里玛阶层连结在了一起，此前由于分裂的社会结构，两者处于几乎隔离的状态，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精英意识到农村穆斯林在政治参与方面的重要性，并寻求毛拉的帮助来动员群众，为孟加拉穆斯林团结提供了合作基础。而这一时期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孟加拉伊斯兰本土化进一步发展，表现出孟加拉穆斯林寻求“穆斯林身份”与“孟加拉人身份”融合的愿望。

这一时期，孟加拉穆斯林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孟加拉印度教文学和传统区分开来，不仅将《古兰经》翻译为孟加拉语，来帮助孟加拉穆斯林正确进行宗教活动和仪式，以米尔·穆沙夫·侯赛因（Mir Musharaf Husain）为代表的孟加拉穆斯林作家更是使用孟加拉语出版了多部关于穆斯林先知、圣徒和英雄的传记作品，希望以此“激发孟加拉穆斯林的信心”。^⑧孟加拉语宗教文学著作的产生具有了反抗殖民侵略的特殊意义，一批又一批具有宗教意义的文学作品问世，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孟加拉穆斯林的宗教知识，更对引导孟加拉穆斯林寻求自身认同产生了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后，在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孟加拉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1906年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成立后，在英属印度建立一个独立穆斯林家园的呼声高涨，这一呼吁马上获得了孟加拉地区穆斯林群众的广泛支持。最终在1947年8月，英属印度按照主体居民宗教信仰的不同，划分为以印度教徒为主体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四、反复阶段：巴基斯坦时期（1947—1971）

1947年印巴分治时，孟加拉作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被划归巴基斯坦管辖，更名为东巴基斯坦。起初，孟加拉人认为这个以共同信仰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将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但他们很快就对自己在新国家中的地位感到失望，孟加拉民族主义逐渐在孟加拉穆斯林意识中占据了上风，世俗主义情绪的高涨使孟加拉伊斯兰本土化进入了反复阶段。

一方面，印度教徒和英国统治者撤离后所留下的权力和职位空缺都被来自西巴基斯坦社会经济更发达地区的穆斯林所取代，孟加拉人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54%，但在行政、军事和金融机构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⑨西巴基斯坦从东巴基斯坦获得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发展，东巴基斯坦人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对孟加拉语和孟加拉文化的蔑视引发了孟加拉人的强烈不满。20世纪40年代中期，孟加拉语已经成为孟加拉国穆斯林的大众交流用语，但巴基斯坦领导人认为只有乌尔都语才能体现出伊斯兰国家精神，孟加拉语的文字和词汇与梵文相似，是印度教文化的一部分，执意将乌尔都语定为巴基斯坦唯一官方语言。^⑩除此之外，政府还试图在孟加拉文学中加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以冲淡孟加拉语的影响。^⑪这些决策引发了孟加拉人的广泛抗议，语言运动逐渐演变成了全东巴基斯坦范围的群众运动，最终在1956年，巴基斯坦制宪议会迫于压力将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一起定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

西巴基斯坦领导人推行的去孟加拉文化计划均以失败告终，语言运动的胜利使得孟加拉文化在东巴基斯坦重新占据了主流位置。随着新一代城市精英的成长，孟加拉伊斯兰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的文化以孟加拉语为基础，将伊斯兰教与孟加拉丰富的民间传统糅合，使得“孟加拉穆斯林跨越阶级、地区和宗教分歧团结在一起”。^⑫语言运动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逐步超过了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感。^⑬随着“孟加拉人身份”意识的觉醒，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带有了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争取自治已经成为孟加拉人的主要目标。1953年，孟加拉主要政治力量人民穆斯林联盟（Awami Muslim League）更名为人民联盟（Awami League），以强调其世俗主义倾向。但在西巴基斯坦政府的阻碍下，孟加拉人政治层面上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的爆发。1971年12月，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就在建国前夕，孟加拉人优先考虑的是其“孟加拉人身份”，更希望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等符合西方价值观的社会，“伊斯兰教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和个人的信仰十分重要，但却并非国家认同的一部分。”^⑭这意味

着新建立的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文化将拥有与巴基斯坦不同的特征。

五、调整阶段：1971年至今

孟加拉国独立后，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伊斯兰教经过不断调整逐步适应了孟加拉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孟加拉人也由此完成了孟加拉民族主义身份的构建，伊斯兰教本土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孟加拉国独立之初，缩小伊斯兰教的公共影响成为政府的基本做法。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立国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教政分离政策，禁止宗教政党的活动。这一决策最初获得了刚经历过独立战争世俗主义情绪高涨的孟加拉人民的支持，政府的一些去伊斯兰化政策，如将学校建筑中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词汇删除、关闭伊斯兰学院等措施也被群众所接受。^⑤但1972年1月24日，政府颁布《孟加拉国合作者法令》，宣布逮捕、审判和处罚独立战争期间与巴基斯坦军方合作的组织和个人，引发了孟加拉国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严重对立。法令颁布后几乎所有与伊斯兰政党和组织有关的成员都受到了指控，政府权力的滥用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穆吉布·拉赫曼试图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伊斯兰价值观的做法最终导致政府倒台，其后的领导人不得不根据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基本国情来对伊斯兰教政策进行本土化的调整。

在军政府时期（1976—1990年），政府为维护政权合法性改变了伊斯兰教相关政策。齐亚·拉赫曼（Ziaur Rahman）总统首先于1976年7月取消了宗教政党参与政治的禁令，其后又在1979年4月通过宪法第五次修正案，以“对全知全能真主的信任和信仰”代替了建国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世俗主义”。1988年6月，政府通过宪法第八修正案，将伊斯兰教立为孟加拉国国教。此外，政府还通过设立伊斯兰基金会、伊斯兰大学和伊斯兰研究中心，成立孟加拉国伊斯兰学校教育委员会等多项举措，加强伊斯兰价值观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随着伊斯兰教在政治领域的回归，伊斯兰政党迅速发展。1991年孟加拉国恢复议会民主制后，伊斯兰政党一度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关键角色。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孟加拉国内个别组织以伊斯兰教的名义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引发社会动荡，孟加拉国

精英和民众开始反思多年以来的伊斯兰教政策，并改变了对伊斯兰教政治化的态度。2009年，人民联盟当选为执政党，标志着世俗主义又一次在孟加拉国占据了上风。2010年2月，孟加拉国最高法院裁定宪法第五修正案违宪，重申了世俗主义原则；2011年6月，人民联盟通过宪法第十五次修正案，正式恢复了1972年宪法中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再次限制了宗教政党的活动。人民联盟的一系列世俗化政策将伊斯兰政党排除在了主流政治之外，在2014年和2018年大选中，人民联盟均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连任。目前来看，虽然“保卫伊斯兰联盟”（Hefazat-e-Islam Bangladesh）在民间的崛起使孟加拉国政府迫于压力对伊斯兰力量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国家总体上对伊斯兰教政治化采取的是限制的政策，伊斯兰力量对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极为有限。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政策并非是要打击作为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是反对政治组织对伊斯兰教的工具化运用。

总的来说，1971年独立后孟加拉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就是不断调整适应孟加拉国政治动态的过程，如何实现世俗政治和伊斯兰社会的动态平衡是每一任孟加拉领导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与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为立国基础不同，孟加拉国独立是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结果，其国民身份认同基于民族和语言，世俗主义是孟加拉国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使得伊斯兰教难以成为孟加拉国家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建国后，随着孟加拉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孟加拉穆斯林逐渐完成了“穆斯林”与“孟加拉人”两种身份的融合。对大多数孟加拉人来说，伊斯兰教主要是一种个人信仰以及习俗和道德观念，而不是国家身份的象征，因而孟加拉国在社会领域保持浓郁伊斯兰色彩的同时，政治领域始终呈现出鲜明的世俗特征，孟加拉国由此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六、孟加拉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特点

自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孟加拉地区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加上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孟加拉伊斯兰文化。从整体来看，孟加拉伊斯兰教本土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信仰主体与外在形式的本土化。信仰主体的

本土化表现为孟加拉人作为孟加拉国主体民族占据了人口的98%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同时,曾作为官方语言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被以梵语为基础的孟加拉语所取代,成为孟加拉穆斯林的主要日常用语。外在形式的本土化主要表现为清真寺的设计与孟加拉传统建筑风格相融合,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孟加拉地区湿热多雨,清真寺等宗教建筑为快速排水多采用一种曲线屋顶,其内部结构也与其他地区相对开放的清真寺不同,通常使用半开放阳台和封闭的祈祷场所,并配有足够数量的遮阳和遮雨的凹窗。^②此外,为了防止雨水渗透到室内,孟加拉国清真寺的门普遍偏小。^③

第二,融合性特征明显。“融合是孟加拉伊斯兰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外入性宗教和土著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形成了孟加拉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生活模式。”^④在伊斯兰教进入孟加拉前,孟加拉人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其文化与西亚主流伊斯兰文化截然不同,印度教在传统文化、服饰、饮食习惯等方面影响至深。伊斯兰教传入后,孟加拉人并未完全抛弃原有的信仰传统和民俗文化,而是将其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孟加拉伊斯兰文化。由于远离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地带,孟加拉地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本土传统,今天的孟加拉文化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文化的混合体。

第三,宗教生活与国家政治界限分明。现代孟加拉国起源的世俗特征使得政府和多数民众都对伊斯兰教的政治化持警惕态度,政府在保护民众信仰自由的同时,力图约束伊斯兰教的政治参与。虽然孟加拉国是世界第四穆斯林人口大国,但伊斯兰政党从未成为该国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孟加拉国宪法将伊斯兰教立为国教,但并不承认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概念。^⑤孟加拉国沿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司法体系,伊斯兰教法仅在穆斯林社区的部分民事事务中发挥作用。2001年,孟加拉最高法院裁定“法特瓦只能自愿接受,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⑥,以此限制了伊斯兰教在司法领域的影响力。但为了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孟加拉国建立了独特的伊斯兰教教育体系。一方面,政府将宗教教育纳入了公共教育体系,宗教课程是一至十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教科书由国家课程和教科书委员会(National Curriculum and Textbook Board)统一编写,

所有公立大学也都提供伊斯兰研究和相关科目的高等教育。^⑦另一方面,全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官方和私人宗教学校,以培养信仰延续所需的宗教人才。

第四,苏菲主义影响持续存在。苏菲派在孟加拉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一度成为孟加拉地区伊斯兰教的主流形态。其中所演变出的“皮尔崇拜”在孟加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孟加拉穆斯林来说,圣徒不仅能对大众进行精神指引,甚至具有特殊的超自然力量,直到今天,仍有大量孟加拉穆斯林前往圣墓对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困难进行祈祷。^⑧此外,苏菲派包容和温和的特点使得孟加拉国人民具有突出的和平特征,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国家基于宗教理由歧视任何公民,每个宗教团体或教派都有权建立、维持和管理其宗教机构”,并强调“不得对非穆斯林宣讲和从事宗教活动施加任何限制”。^⑨在宗教自由理念的指导下,孟加拉国同时将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以及佛教的重大宗教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政府每年都向宗教少数人口,即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基督徒提供特别财政支持。此外,孟加拉国国家电视台(BTV)每天都会诵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印度教的《博伽梵歌》、佛教的《大藏经》和基督教的《圣经》^⑩,这种富有智慧的政策使得孟加拉国呈现出宗教和谐的图景。

第五,民间巫术和神灵崇拜的留存。在孟加拉国至今仍存在着形式多样的民间巫术和对神灵、鬼怪及野生动物的崇拜。部分农村穆斯林坚信疾病是民间神灵的附体,“当人们感染疾病或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召唤驱魔师来使用魔法和符咒。许多人像印度教徒一样相信咒语和巫术。”^⑪一方面,这种信仰根植于孟加拉人开发三角洲地区的历史记忆,孟加拉严酷的自然环境为巫术和民间信仰的留存提供了条件,其中恒河三角洲地区巫术最为盛行,很多地区都保留着对蛇和鳄鱼等动物神灵的崇拜;另一方面,在孟加拉农村地区,毛拉引入伊斯兰术语和名称代替印度教和本土元素的咒语,通过形式上的伊斯兰化将这些巫术和咒语纳入了伊斯兰教体系,并保存至今。

第六,极具民族特色的音乐传统。伊斯兰教传入孟加拉地区后,与本土印度教、佛教及民间传统相结合,演变出了孟加拉本土色彩鲜明的穆斯林音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鲍尔歌曲(Baul songs)和纳兹鲁尔音乐(Nazrul

Geeti)。鲍尔歌曲是孟加拉穆斯林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早期内容主要颂扬爱神和神秘主义，吟游诗人通过将苏菲派与印度教的符号融合在一起，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词汇进行演唱，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提供了一个超越宗教派别限制的信仰氛围。^⑤鲍尔歌曲吸收了大量孟加拉本土元素，许多口头流传至今的民间歌谣中体现出了伊斯兰教与当地神灵的融合。2005年，鲍尔传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纳兹鲁尔音乐是孟加拉国著名穆斯林音乐家卡齐·纳兹鲁尔·伊斯兰姆(Kazi Nazrul Islam)所开辟的音乐流派，他将伊斯兰教与孟加拉民间音乐相结合，在歌词中融入了革命观念以及哲学和浪漫主义主题，歌曲富有激励性和革命性，在独立战争期间极大地鼓舞了孟加拉人民。

总之，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过程，就是在各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在全球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区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世界宗教之林的大观园里，伊斯兰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正是各具特色的本土化的结果。孟加拉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历史际遇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其伊斯兰教本土化呈现出包容、融合和去政治化的特点，其伊斯兰文化也明显区别于中东和南亚次大陆其他穆斯林国家，具有鲜明的孟加拉特色。

(作者李福泉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雪羽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 ① “孟加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8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64/1206x0_676766/，2021年11月27日浏览。
- ② Abdullah Al-Ahsan, “Spread of Islam in Pre-Mughal Bengal”,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2, No.1, 1994, p.44.
- ③ Shah Noorur Rahman, “Islam and its Early Introduction in Bengal”, in Aniruddha Ray and Barun D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56, 1995, p.427.
- ④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93.
- ⑤ Asim Roy, *The Islamic Syncretistic Tradition in Benga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8.
- ⑥ Abu Musa Mohammad Arif Billah. “The Development of Bengali Literature during Muslim Rule”, *South Asian Cultural Studies*, Vol.1, No.2, 2007, p.47.

- ⑦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97.
- ⑧ Barbara D. Metcalf, eds., *Islam in South Asi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77.
- ⑨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08.
- ⑩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19.
- ⑪ [荷]威廉·冯·申德尔：《孟加拉国史》，李腾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2011年，第33页。
- ⑫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95.
- ⑬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9.
- ⑭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99.
- ⑮ Shah Noorur Rahma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yncretism in Medieval Bengal”, *The North-Eastern Hill University Journal*, Vol.XVI, No.2, 2018, p.59.
- ⑯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26.
- ⑰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
- ⑱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111.
- ⑲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90.
- ⑳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183.
- ㉑ Philip Oldenburg, “A Place Insufficiently Imagined: Language, Belief, and the Pakistan Crisis of 1971”,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 No.4, 1985, p.721.
- ㉒ Golam Dastagir, “Cultural Roots of Islam in Bangladesh and Islamisation”, *Islam and Civilisational Renewal Journal*, Vol.4, No.1, 2016, p.136.
- ㉓ Willem van Schendel,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8.
- ㉔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123.
- ㉕ [荷]威廉·冯·申德尔：《孟加拉国史》，李腾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2011年，第186页。
- ㉖ Syed Aziz-al Ahsan, *Isla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Dualistic Cultur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90, p.139.
- ㉗ Ishrat Islam, Allen G. Noble, “Mosque Architecture in Bangladesh: The Archetype and Its Changing Morphology”,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Vol.17, Issue.2, 1998, p.7.
- ㉘ Ishrat Islam, Allen G. Noble, “Mosque Architecture in Bangladesh: The Archetype and Its Changing Morphology”,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Vol.17, Issue.2, 1998, p.4.
- ㉙ Asim Roy, *The Islamic Syncretistic Tradition in Benga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8.
- ㉚ Jahid Hossain Bhuiyan, “Law and Religion in Bangladesh”,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017, Issue.4, 2017, p.839.
- ㉛ Jahid Hossain Bhuiyan, “Enforcement of Fatwas in Bangladesh and the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Fundamental Rights of Others: Compromising Between Rights”, *Asia-Pacific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Vol.18, 2017, p.159.
- ㉜ Mumtaz Ahmad, *Islamic Education in Bangladesh: Tradition, Trends, and Trajectories*, Islamic Education in South & Southeast Asia Survey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une, 2006, p.8.
- ㉝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0.
- ㉞ Jahid Hossain Bhuiyan, “Law and Religion in Bangladesh”,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017, Issue.4, 2017, p.868.
- ㉟ Golam Dastagir, “Cultural Roots of Islam in Bangladesh and Islamisation”, *Islam and Civilisational Renewal Journal*, Vol.4, No.1, 2016, p.136.
- ㊱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8.
- ㊲ Suniti Kumar Chatterji, “Hindu-Muslim Baul and Marafati Songs in Bengali Literature”, *Indian Literature*, Vol.15, No.3, 1972, p.15.